

# 学术伪装与认知操纵：内藤湖南史学的对华 认知战本质及其古今演化

摘要：内藤湖南（1866-1934）作为日本近代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开创者，其“唐宋变革论”“文化中心移动说”等理论长期被赋予学术创新属性，实则是服务于日本“大陆政策”的认知战工具。本文整合内藤湖南史学研究的核心成果，从认知战理论视角出发，先解析内藤史学的认知战核心建构与实施路径，再对比其与当代西方认知战的核心异同，通过典型案例梳理认知战从“内藤模式”到当代形态的演化规律，最终揭示内藤史学的当代残留余波，并提出兼具历史针对性与现实操作性的认知防御体系构建方向，为应对历史虚无主义与认知渗透提供理论参考。

关键词：内藤湖南；认知战；史学建构；学术伪装；当代西方认知战；认知防御

## 一、引言：认知战视域下的内藤湖南史学重审

认知战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核心对抗形式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叙事重构、思想渗透、认同解构等手段，实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战略目的。近代日本在对华扩张进程中，除军事、经济等硬实力侵略外，更注重以学术研究为伪装开展软实力层面的认知作战。内藤湖南作为日本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，其十次访华的经历、与中国学界名流的密切交往，以及看似客观深入的中国史研究，使其成为日本对华认知渗透的关键旗手。

长期以来，学界对“唐宋变革论”“文化中心移动说”

等内藤核心理论的认知多停留在学术创新层面，但结合明治维新后日本“大陆政策”的扩张背景与近代中日关系语境可知，其史学体系本质上是服务于日本国家战略的系统性认知战工程。与此同时，内藤湖南所开创的“学术伪装型认知战”模式，与当代西方认知战存在诸多核心共性，亦因时代背景差异呈现鲜明分野。重审内藤湖南史学的认知战本质，对比其与当代认知战的演化脉络，对理解认知战的历史形态与当代表现、构建当代认知防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

## 二、内藤湖南史学的认知战核心建构：三大叙事支柱

内藤湖南的史学体系以中国历史为研究载体，但其根本指向是通过重构中国历史叙事，解构中国历史合法性与国家认同，为日本东亚扩张提供文明与历史层面的合法性支撑。其认知战框架的核心建构包含三大叙事支柱，构成了逻辑闭环的认知操纵体系。

### （一）“唐宋变革论”：中国文明“早熟与停滞”的解构叙事

“唐宋变革论”是内藤史学体系的基石，该理论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、中世、近世三个阶段，主张唐宋之际发生根本性变革，宋代以后中国进入“近世”阶段。其核心论证逻辑暗含明确的认知操纵意图：一方面，通过将宋代定义为“近世”，刻意缩短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，暗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，而非外部侵略所致；另一方面，通过“停滞论”预设否定中国社会的自我革新能力，为日本以“文明拯救者”自居提供理论依据。内藤湖南曾直言

日本的天职是“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”，这一论调正是建立在“中国文明已衰老停滞”的认知前提之上。

该理论以扎实的史料考证为外衣，对宋代科举制度、文官体系的分析不乏合理成分，但这些局部真实的实证研究最终均服务于“中国文明停滞”的核心预设，形成“局部真实、整体虚假”的认知陷阱，成为解构中国发展合法性的重要工具。

## **（二）“文化中心移动说”：文明霸权转移的建构叙事**

“文化中心移动说”是内藤湖南为日本争夺东亚文明主导权构建的核心叙事。该理论主张中国文化发展历程是文化中心不断移动的过程——从洛阳到长安，再到江南，而近代以来文明中心已转移至日本。内藤在甲午战争期间发表的《地势臆说》《日本的天职与学者》等文章中明确提出，“文明之中心，今又将有大移动”，日本正是这一新的文明中心，肩负着“光耀国威”“成就东方之新极致”的使命。

这一叙事的认知操纵逻辑体现在三个层面：其一，解构中国作为东亚文明核心的历史地位，将中国文明从“源头”降格为“过渡环节”；其二，构建日本文明的“正统性”与“优越性”，通过“文化中心转移”的历史叙事，为日本主导东亚提供文明层面的合法性；其三，包装“中日文化同一论”，将日本文化塑造成中国文化的“延长点”与“继承者”，模糊侵略本质，构建“文化共荣”的虚假认知。

## **（三）“南北二元对立论”：多民族国家的分裂叙事**

内藤湖南与白鸟库吉等日本学者共同建构的“南北二元

对立论”，是直接服务于日本领土扩张的认知工具。该理论将东亚大陆历史歪曲为“长城以南的汉族”与“长城以北的外族”的对抗史，将匈奴、鲜卑、蒙古、满族等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定义为与汉族敌对的“外国”或“外族”，刻意割裂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。

在此基础上，内藤进一步暗示“满蒙非支那”，将中国领土局限于“汉地 18 省”，同时刻意拉近日本与中国北方民族的文化亲缘关系。这一叙事的战略意图极为明确：一方面，通过否定中国对满蒙地区的历史主权，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提供学术辩护；另一方面，通过制造民族对立，解构中国的多民族国家认同，从内部瓦解中国的国家统一，完全无视元代辽阳行省、明代千户所、清代盛京将军体制对东北的有效治理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虚构。

### **三、内藤模式与当代西方认知战的核心异同：认知操纵的古今分野**

内藤湖南的史学认知战与当代西方认知战，本质上都是通过解构目标国历史叙事、价值体系与身份认同塑造有利认知环境，但因时代背景与技术条件差异，呈现出核心共性与鲜明分野并存的特征。

#### **（一）核心共性：以叙事重构为核心的认知操纵逻辑**

1. 叙事解构与重构的双重路径：二者均遵循“先否定目标国历史合法性，再植入自身战略叙事”的操作范式。内藤通过“中国文明停滞论”解构中国历史发展性，以“文化中心移动说”重构日本东亚文明主导地位；当代西方认知战

则通过“历史虚无主义”解构他国革命史、建设史，以“普世价值”叙事重构西方道德与制度优越性。

2. 学术与舆论的联动传播机制：二者都善于利用“学术中立性”掩盖政治意图，降低目标群体警惕性。内藤以京都学派学术研究为“理论内核”，通过报纸专栏、大学教育扩散认知主张；当代西方认知战则以智库研究报告、学术期刊论文为“学术伪装”，借助社交媒体、影视文化、非政府组织等渠道实现全球传播。

3. 身份认同的靶向打击目标：二者终极目标都是摧毁目标国集体认同，削弱内部凝聚力。内藤的“南北二元对立论”直接针对中国多民族国家认同，试图割裂汉族与边疆民族历史联系；当代西方认知战则聚焦目标国民族、宗教、阶层等身份差异，通过煽动对立情绪瓦解社会共识。

## **（二）核心差异：基于时代背景的实施路径分野**

1. 战略目标的维度差异：内藤模式服务于近代日本殖民扩张与东亚霸权争夺，目标是为军事侵略提供“文明合法性”，本质是区域性帝国争霸工具；当代西方认知战服务于西方国家全球霸权维护，目标是遏制新兴大国崛起、巩固西方主导国际秩序，具有鲜明全球性与系统性特征。

2. 传播手段的技术差异：内藤所处时代，传播媒介以报纸、书籍、课堂为主，信息传播具有单向性、区域性、时效性弱的特点，认知渗透周期较长；当代西方认知战依托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，构建多向互动、全球覆盖、即时传播的认知作战体系，通过算法推荐实现精准“信息投

喂”，认知操纵效率与隐蔽性大幅提升。

3. 作战主体的组织差异：内藤的认知战实践以学者个体+学术流派+媒体平台的松散联动为主，缺乏统一战略指挥体系；当代西方认知战形成了政府主导、智库策划、媒体执行、非政府组织配合的专业化作战网络，如美国“民主基金会”“兰德公司”等机构承担明确认知战任务，具有高度组织性与计划性。

#### **四、认知战的实践演化：从内藤模式到当代形态的典型 案例**

内藤湖南开创的“学术伪装型认知战”模式，不仅深刻影响了近代日本对华战略，其核心逻辑还被后世延续并演化，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认知战实践形态，以下结合典型案例展开分析。

##### **（一）内藤模式的直接延续：冷战时期苏联对东欧的历史叙事操纵**

冷战期间，苏联对内东欧国家的历史研究进行系统性干预，操作手法与内藤模式一脉相承。苏联学者通过重构东欧国家历史叙事，将东欧民族独立运动歪曲为“苏联领导下的反法西斯斗争成果”，将东欧现代化进程定义为“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成就”，刻意弱化东欧国家历史主体性。同时，苏联通过控制东欧大学历史教材编写、学术期刊出版，传播“苏联是东欧文明保护者”的叙事，本质上是内藤“文化中心移动说”的冷战版本。这一认知操纵最终随苏联解体破产，但造成的历史叙事混乱，至今仍影响部分东欧国家的历史认

同。

## **（二）当代西方认知战的典型实践：针对俄罗斯的历史叙事攻击**

俄乌冲突爆发后，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发起大规模认知战，核心手段之一便是解构俄罗斯历史合法性，延续了内藤模式“叙事解构”的核心逻辑，但更凸显当代认知战的技术化特征。西方媒体与智库刻意歪曲俄乌两国历史渊源，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历史影响定义为“殖民侵略”，否定东斯拉夫人共同历史文化纽带；同时通过炒作“卡廷惨案”“苏联解体”等历史事件，强化“俄罗斯是扩张主义国家”的负面叙事。与内藤的“学术伪装”不同，西方更注重舆论煽动与信息轰炸，通过社交媒体“水军”“舆论领袖”制造信息茧房，甚至不惜篡改历史事实，体现了当代认知战“技术化、规模化、舆论化”的特征。

## **（三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范式移植：以西方对拉美的“普世价值”渗透为例**

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拉美国家开展认知战，其核心逻辑与内藤“中国文明停滞论”异曲同工——通过否定目标国发展道路，植入自身制度与文明优越感。西方智库通过发布拉美国家“民主指数”报告，将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与“民主程度”绑定，刻意抹黑拉美左翼政府治理成就；同时通过资助拉美反对派势力、非政府组织，传播“自由市场+西式民主”的叙事模式。这一实践是内藤“学术-舆论-政策”联动路径在当代的移植，只是将“文明优劣论”替换

为“民主优劣论”，本质仍是通过认知操纵服务地缘政治目标。近年来拉美兴起的“左翼复兴”浪潮，正是对这种认知渗透的反向抵制。

#### **（四）内藤模式的本土实践路径：学术－舆论－政策的闭环传导**

内藤湖南的认知战并非单纯理论建构，而是通过“学术研究－舆论传播－政策支撑”的完整链条深度介入日本对华战略。其一，学术伪装是核心手段，内藤注重原典阅读、史料考证，参与敦煌文书整理、满文老档收集等学术活动，著作《支那上古史》《支那史学史》看似具备严谨学术体例，与罗振玉、王国维等中国学者的交往更提升其“中国通”声誉，以“局部真实、整体虚假”的认知陷阱渗透学术话语体系；其二，舆论传播是扩散渠道，内藤早年担任《台湾日报》《大阪朝日新闻》主笔与专栏作家，日俄战争期间宣扬开战论声名大振，将史学观点转化为通俗舆论话语传播；同时任教于京都大学二十年培养大批弟子，形成京都学派，通过教育系统实现认知主张的代际传承；其三，政策支撑是最终目标，其“文化中心移动说”为日本主导东亚提供文明合法性，“满蒙非支那”的分裂叙事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提供了直接的学术辩护，而“中国文明停滞论”则成为日本以“文明开化者”自居、推行殖民统治的思想基础。

这一闭环传导的实践逻辑清晰可辨：内藤通过学术研究构建的三大叙事，经报纸专栏、课堂教学等渠道转化为日本社会的普遍认知，形成“侵略有理、殖民有功”的舆论氛围；

这种社会认知进而反向推动日本政府将“大陆政策”从战略构想转化为具体行动——从甲午战争后对台湾的殖民统治，到日俄战争后对东北权益的争夺，再到九一八事变后“伪满洲国”的炮制，均能看到内藤史学叙事的直接或间接影响。京都学派后续学者如矢野仁一、桑原鹭藏等，进一步深化“满蒙非中国”“中国无国境论”等谬论，为日本侵华战争提供持续的学术支撑，使内藤开创的“学术伪装型认知战”完全融入日本对华侵略的整体战略，成为军事、经济侵略之外，瓦解中国抵抗意志、摧毁中国历史认同的“软刀子”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这一闭环并非单向输出，而是形成双向强化：日本侵华的军事进展为内藤史学的“合理性”提供了现实“佐证”，使其叙事在日本国内更具说服力；而史学叙事的传播又进一步动员民众支持战争，为侵略行为提供人力、物力支撑，最终形成“学术建构—舆论动员—政策实施—现实反馈—叙事强化”的恶性循环，充分暴露了内藤史学服务于日本扩张主义的本质，也印证了认知战作为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工具的战略价值。

## 五、当代警示：日本与美国对华认知作战的现实图景

内藤湖南开创的“学术伪装型认知战”模式，并未随二战结束而消亡，反而在日本的历史延续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得到升级演化。当前，日本与美国基于各自地缘政治诉求，形成了针对中国的双重认知作战网络，其手段延续了“叙事解构—认同打击—利益植入”的核心逻辑，同时结合时代特征呈现出更隐蔽、更系统、更具针对性的新形态，成为

威胁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风险源。

### **（一）日本对华认知作战：内藤模式的当代延续与局部升级**

日本对华认知战始终未脱离内藤湖南构建的核心框架，而是在历史叙事、文化渗透、身份离间三个维度持续深化，同时规避直接军国主义表述，以“学术中立”“文化交流”为新伪装，延续其解构中国历史合法性与国家认同的核心目标。

在历史叙事层面，内藤“中国文明停滞论”被改造为“中国发展威胁论”的历史注脚。部分日本学者延续内藤对中国历史的碎片化解读，通过片面放大中国古代王朝的“扩张性”，歪曲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史，将当代中国的发展崛起污蔑为“历史扩张的延续”；在教科书编纂与学术研究中，刻意弱化日本侵华历史的罪责，将“南京大屠杀”“731部队罪行”等历史事实边缘化，甚至通过“学术争鸣”的名义传播“侵略未定论”，本质上是内藤“局部真实、整体虚假”认知陷阱的当代复刻。同时，日本通过靖国神社参拜、“历史修正主义”言论扩散等方式，构建“日本是东亚文明受害者与守护者”的虚假叙事，对冲中国的历史正义话语权，呼应内藤当年“文化中心移动说”的文明霸权争夺逻辑。

在文化渗透层面，日本将内藤“中日文化同一论”升级为“文化亲缘性陷阱”。通过动漫、影视、游戏等流行文化产品，植入“中国传统文化日本化”的隐性叙事——将汉服元素、传统节庆、历史人物进行日本化改造，模糊中日

文化的源流关系，潜移默化地削弱中国青年群体对自身文化的主体性认知；借助“汉学交流”“民俗研究”等学术活动，持续输出“中国传统文化已断层，日本才是中华文化正统继承者”的谬论，延续内藤解构中国文明核心地位的战略意图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日本利用民间交流的亲和力，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“中国社会治理落后”“民主自由缺失”的偏见性认知，将文化交流异化为认知渗透的载体，复刻了内藤“学术—舆论”联动的传播机制。

在身份离间层面，内藤“南北二元对立论”演变为针对中国边疆问题的分裂叙事。日本通过资助“藏独”“疆独”等分裂势力的相关研究，在国际学术会议与期刊中发表虚假研究报告，歪曲西藏、新疆与中国内地的历史联系，将边疆地区的发展治理污蔑为“文化压迫”“民族同化”，试图割裂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纽带。这种操作完全延续了内藤“满蒙非支那”的分裂逻辑，只是将目标从东北转向西南、西北边疆，通过煽动民族对立，从内部瓦解中国的凝聚力，服务于其遏制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目标。

## **（二）美国对华认知作战：全球体系下的技术赋能与系统围堵**

如果说日本的认知战是内藤模式的“历史延续”，美国的对华认知战则是当代西方认知战的“集大成者”。美国以全球霸权维护为核心目标，将内藤的“学术—舆论—政策”链条升级为“政府—智库—媒体—技术平台”的全球化作战体系，借助技术优势与全球网络，对中国开展全

方位、多层次、高强度的认知围堵。

在制度叙事层面，美国延续了当代西方认知战“普世价值”植入的核心逻辑，将内藤“否定目标国发展合法性”的思路升级为“制度优劣论”。美国智库（如兰德公司、布鲁金斯学会）定期发布针对中国的“民主指数”“人权报告”，将经济发展、社会治理与西式民主强行绑定，刻意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；通过学术期刊、国际论坛等渠道，传播“中国模式不可持续”“中国制度是威权主义”的虚假叙事，解构中国发展道路的合法性，本质上是内藤“中国文明停滞论”在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转译。同时，美国将“历史虚无主义”精准应用于中国革命史与建设史，通过社交媒体炒作“革命历史虚构论”“建设成就夸大论”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，削弱中国民众对国家制度的认同。

在技术赋能层面，美国突破了内藤时代单向传播的局限，构建起技术驱动的精准确知操纵体系。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算法，美国通过 TikTok、Facebook 等全球社交媒体平台，向中国不同群体进行“定制化信息投喂”：针对青年群体，推送“躺平主义”“精致利己”等价值观，瓦解其奋斗精神与国家责任感；针对知识分子群体，传播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下的“中国问题批判论”，诱导其对中国发展产生质疑；针对边疆地区群体，煽动民族对立与宗教极端情绪，制造社会撕裂。这种“算法围猎”模式，将内藤“身份认同靶向打击”的逻辑发挥到极致，通过构建“信息茧房”，实现认知渗透的精准化与高效化。

在议题操弄层面，美国将认知战与地缘政治议题深度绑定，形成“舆论抹黑—政策打压—认知固化”的闭环。在台湾问题上，通过传播“台湾地位未定论”“两岸历史非同源论”，歪曲两岸关系的历史与法理基础，强化“台独”分裂势力的认知支撑；在新疆、香港问题上，编造“强迫劳动”、“人权危机”等虚假信息，通过非政府组织（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相关机构）在全球扩散，配合制裁、外交孤立等手段，将虚假叙事固化为部分国际社会的“既定认知”；在科技领域，炒作“中国芯片威胁论”“5G安全风险论”，将技术竞争意识形态化，既遏制中国科技发展，又塑造“中国技术不可信”的全球认知。这种“议题化认知战”，比内藤时代单纯的历史叙事操纵更具现实破坏力，直接服务于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全球战略。

### **（三）日美对华认知作战的协同与分野**

日美对华认知作战虽基于各自战略诉求，但在核心目标、操作逻辑上存在显著协同性，同时因自身优势与定位呈现明显分野。

协同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：其一，目标协同，均以解构中国历史合法性、瓦解国家认同、遏制中国发展为核心目标，本质上是内藤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认知战逻辑的当代延伸；其二，叙事协同，日本的“历史修正主义”与美国的“历史虚无主义”相互呼应，共同否定中国的历史正义与发展道路；日本的“文化正统论”与美国的“普世价值论”形成互补，从文化与制度两个维度夹击中国的价值体系；其三，渠

道协同，日本借助其在东亚文化圈的影响力，侧重对中国周边国家与国内青年群体的渗透；美国依托其全球媒体网络与技术平台，主导全球对华舆论议程，形成“区域渗透+全球围堵”的双重认知封锁。

分野则集中在三个维度：其一，核心抓手不同，日本以“历史叙事重构”与“文化亲缘性渗透”为核心，延续内藤的学术伪装传统，手段更隐蔽、周期更长；美国以“制度对抗”与“技术赋能舆论战”为核心，手段更直接、强度更高、覆盖更广；其二，战略侧重不同，日本更关注中国边疆问题与文化主体性，试图从内部瓦解中国的统一与文化自信，服务于其在东亚的地缘平衡诉求；美国更关注中国制度模式与全球影响力，试图通过认知战遏制中国全球话语权提升，巩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；其三，组织模式不同，日本仍以“学术流派 + 媒体 + 民间组织”的松散联动为主，政府隐性引导；美国则形成“政府主导、智库策划、媒体执行、技术平台支撑”的高度专业化网络，组织性与计划性远超内藤模式与日本当代实践。

六、认知防御体系的升级构建：应对日美认知作战的实践路径

面对日本与美国对华认知作战的现实威胁，需在原有防御框架基础上，结合日美认知战的特点与演化规律，构建“靶向防御 — 系统反制 — 主动塑造”三位一体的升级防御体系，既守住历史叙事与国家认同的底线，又突破日美的认知封锁。

### **（一）靶向防御：破解日美认知作战的核心手段**

针对日本的“历史叙事歪曲”与“文化渗透”，需要强化历史叙事的实证支撑与文化主体性构建。一方面，组建跨学科学术团队，系统梳理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史料证据，针对日本歪曲的边疆历史、古代王朝关系等核心议题，发布权威学术报告与通俗读本，以扎实的实证研究反击“局部真实、整体虚假”的认知陷阱；另一方面，加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通过数字博物馆、国潮文化、影视精品等载体，强化青年群体对中国文化源流的认知，破解日本“文化正统论”的渗透，构建“源流清晰、认同坚定”的文化防御屏障。

针对美国的“技术化舆论战”与“制度抹黑”，需构建技术反制与话语解构双重防线。在技术层面，加快人工智能虚假信息识别系统建设，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进行监管，破解美国“精准信息投喂”与“信息茧房”制造机制；建立跨境虚假信息监测数据库，重点跟踪美国智库、非政府组织的对华负面报告，及时发布事实核查结果。在话语层面，解构美国“普世价值”的虚伪性，通过案例对比揭示西式民主的制度缺陷与实践困境，同时提炼中国制度优势的核心话语，将“全过程人民民主”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等理念转化为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叙事，对冲美国的“制度优劣论”。

### **（二）系统反制：强化“学术 — 舆论 — 政策”的协同防御链条**

延续内藤模式与日美认知战的核心传播逻辑，构建反向

的“学术—舆论—政策”协同体系。

在学术层面，建立国际学术话语辨析机制，对来自日本、美国的涉华学术研究进行历史语境与政治背景分析，警惕其以“学术创新”为名的认知渗透，同时支持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规则制定，提升中国史学、政治学等领域的国际话语权。

在舆论层面，打造多语种、多平台的国际传播矩阵，利用 TikTok、YouTube 等海外社交媒体，针对不同地区受众推送定制化内容——对东亚地区重点回应日本的历史歪曲，对全球受众重点反击美国的制度抹黑，形成“精准回应、全球覆盖”的舆论反制网络。

在政策层面，将认知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框架，制定《认知安全保护法》，明确对境外势力利用学术交流、文化传播、技术平台进行认知渗透的规制措施，为靶向防御与舆论反制提供法律支撑。

### **（三）主动塑造：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认知叙事**

突破日美“防守型防御”的局限，主动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全球认知叙事。

在历史叙事层面，跳出“被动回应抹黑”的框架，构建“人类文明贡献型”历史叙事，系统传播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、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、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正义、当代中国的脱贫攻坚与全球治理贡献，将中国历史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坐标，破解日美“中国威胁论”的历史注脚。在发展叙事层面，以“中国故事”为载体，通过案例展示中国制度

在促进发展、保障民生、应对危机等方面的实践成效，形成“事实胜于雄辩”的发展叙事，对冲美国“中国模式不可持续”的虚假论断。

在认同塑造层面，深化全民认知安全教育。将认知战知识、中国历史常识、国家认同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，重点培养青少年的历史思辨能力与信息辨别能力；通过媒体公益广告、社区宣讲、网络公开课等形式，普及日美认知作战的常见手段与危害，提升全民对认知渗透的警惕性，构筑起“人人都是认知防御主体”的社会基础。

## 七、结论

内藤湖南的史学思想揭示了认知战“学术伪装—叙事重构—认同解构”的本质规律，而当代日本与美国对华认知作战，则是这一规律在全球化、技术化时代的升级演绎。日本延续了内藤模式的历史叙事操纵与文化渗透逻辑，美国则凭借全球霸权与技术优势，构建了系统性、全球性的认知围堵网络，二者共同构成了针对中国的认知安全威胁。

应对这一挑战，既需要我们认清认知战的历史演化脉络，继承破解“学术伪装”“叙事陷阱”的历史经验；更需要我们立足当代现实，构建靶向精准、系统协同、主动塑造的认知防御体系。历史叙事的争夺从来都是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博弈，唯有强化历史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筑牢认知防御的“精神长城”，才能在日美主导的认知战中守住阵地，为国家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意识形态环境。

内藤湖南的案例与当代日美认知作战的现实均警示我

们：认知安全无小事，历史叙事不松懈，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长期战略博弈。